



杨雄

与《太玄》研究

刘韶军 著



人民
文学
出版
社

杨雄

与《太玄》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 牧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雄与《太玄》研究/刘韶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
ISBN 978-7-01-009956-9

I. ①杨… II. ①刘… III. ①杨雄(前53~81)-思想评论
IV. ①B23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3624 号

杨雄与《太玄》研究

YANGXIONG YU TAIXUAN YANJIU

刘韶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7.5 字数:580 千字

ISBN 978-7-01-009956-9 定价:8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一、研究主旨

本书把考察杨雄^①的人生经历与研究他的重要著作《太玄》结合起来,考察杨雄其人的人生遭际,以此帮助认识《太玄》的撰作原因及其中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杨雄生活在独尊儒术的西汉,这是经学盛行的时代,经学得到朝廷的鼓励而与官位禄利密切相关,许多学者靠治经学而成名或为官,因此学者们一般都以经学为治学的重心,很少关心和研究其他学术。杨雄则与众不同,没有选择朝廷立于学官且能为其带来丰厚禄利的经学,而是在默默中思考玄理,自甘寂寞,不求闻达。所著《太玄》在当时被人们称为“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②,虽然历代有一些学者对《太玄》先后进行注释,但仍被视为难以研究的晦涩之作,张岱年先生曾说:“《太玄》书中用了很多古字奇字,许多文句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隐晦难懂”^③,这是人们对于《太玄》的普遍看法。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整理研究《太玄》,因当时所学为历史文献学,对乾嘉学派的考证学方法颇为景崇,故当时采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对

① 杨雄的“杨”一般写为“扬”,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王先谦等人经过考证认为应为“杨”而不为“扬”,本书采用这一观点,故本书均作“杨雄”,而不作“扬雄”,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② 班固:《汉书·杨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5页。

③ 张岱年:《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一》,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18页。

《太玄》全书进行整理,首先遍查《太玄》的各种版本,校勘《太玄》全书的文字,考证其中的异同是非,其次对《太玄》中不易理解的字词进行考释,对《太玄》的文句进行疏解,以求完整理解《太玄》。此后一段时间内,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对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都有一些研究,仍然是从基本文献入手,再来分析和理解这些文献里的丰富思想内容。

这样就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全貌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再回头看最初对杨雄及《太玄》的整理和研究,就有了许多新的理解,需要进行全面补充。另外,当时只就《太玄》其书整理研究,没有与杨雄其人的研究结合起来,也是一个缺憾。现在的新研究,要在以往注重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与思想的阐释相结合,同时把杨雄其人的研究与《太玄》其书的研究结合起来。

为此先要深入探讨《汉书·杨雄传》的内容,尽量对其中涉及的问题都深加追寻,以求对杨雄其人的理解更为深入而完整。其次则要对《太玄》其书进行全面清理,包括它的历代传本(包括各类版本)及其独特结构体例进行全面整理与分析。然后要对《太玄》的重要思想观念、思想渊源和思维方式进行全面分析阐释,不能停留在字义疏证层面,要将其中的丰富思想内容结合原文文本仔细分疏探讨,这比一般的注疏更为深入详尽,更重视其中的思想内涵,这与乾嘉学派那种考证有所不同。希望通过这种疏解对《太玄》其书的思想内涵有更深入而全面的理解。

最后要把历代学者关于《太玄》的评价尽量搜集完整,希望了解历代学者关于杨雄及其《太玄》的评价都有什么观点和内容。历代学者对杨雄及《太玄》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非赞即贬,双方缺乏对话,未能针对不同的说法进行分析与论证,只是单方面表达自己的看法。两派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既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则不能不探讨为何评价如此不同?这些评价中哪些观点值得反思和吸收,哪些观点需要经过分析而指出其偏颇之处。所以本研究不仅要表达笔者对杨雄及《太玄》的认识与理解,更完整梳理历代学者的相关评价,了解各自的态度与立场,以便由此展开杨雄及《太玄》研究史的研究。

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探索文献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一般的文献学只对某部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如标点、校勘、注释、提要

及介绍其文献价值等,这些工作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如搜集版本再进行校勘考证和注释,在标点时也要研究相关字义与语法,注释解说更要涉及大量的相关知识,提要则要遵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对文献的学术渊源与流派及其作者的时代和内容及体例上的特点等,加以系统而准确的说明,这都不是易事,因此不少人认为文献学应该以这些工作为主,把一部文献的上述情况搞清楚,并加以一定的整理与解释,使人们能够读到尽量没有错误的本子以及得到基本的注解,并了解其一定的文献价值等。

笔者认为,文献学如果只是这样整理研究文献,只能算是整理研究文献的初步工作,只是扫清了研究文献的外围障碍而已,如满足于此,而不深入对文献的全部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则不能称为文献学的研究。真正的文献研究,应该对文献的内容在充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一方面要重视文献的文本注释与解说,要对其文本进行完整注释,不能只拿其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些段落作为阐发观点的材料,而要贯通文献的全部文本进行阐释,充分分析其中的思想内容,这样才能使文献研究达到更为深广的地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也才更有意义。

古代文献有多种类型,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四大类之下又分更多的小类,不管哪种部类的文献,都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仅从一个侧面进行研究都是不充分的,不能穷尽内容,若对文献只从外部进行梳理,而不研究其内容,这样的文献学研究没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因此,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外部的整理只是一种基本工作,必须逐步深入研究其内容,把其中的思想文化内涵全面深入地揭示出来,才可以说完成了文献学的研究任务。所以,对古代文献的研究,不能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或思想史的研究或阐释,一定要从外部开始再逐步深入到其内部,全面研究其内容,这样才会加深我们对于古代文献所蕴涵的各种内容的理解,其研究才会有更大的学术意义。

这种研究,一方面要利用文献学的各种方法,如版本、目录、校勘、训诂、考证等方法,另一方面则要利用思想研究的分析方法,相辅相成,这样才能对古代文献所蕴涵的丰富内容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由此才能发现更多的新内容,从而使相关的研究得到发展。

二、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内容,首先是对《汉书·杨雄传》所载杨雄一生事迹的考察与分析,然后是对《太玄》各种版本的考察与总结,再次是关于《太玄》独特体例的考察,最后是对《太玄》八十一首之外的十一篇思想内容的阐释与分析,并探讨《太玄》的思想渊源及其特殊的三分式思维方法的考察,最后则把历代学者关于杨雄及《太玄》的评论进行全面的资料搜集与整理。

《汉书·杨雄传》是考察杨雄其人及其著作和思想的基本史料,其主要部分是据杨雄的《自序》^①写成的,但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前人对此曾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本研究对前人的相关解释进行深入分析,力求梳理其中的问题所在,希望对历来存疑的问题进行总结。根据《杨雄传》的记载,可以把杨雄的一生分为早、中和晚三个阶段,由此考察杨雄的人生变迁、主要著作以及思想演变,及与他撰著《太玄》有什么关系和意义。

考察杨雄人生的早期事迹,第一个问题是杨雄的姓是“杨”还是“扬”?据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王先谦的研究,可以确定姓为“杨”而非“扬”,现代学者汪荣宝、杨树达等人也都注意到这些考证,但仍有不少人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因此本研究对此进行专门的分析。其次考察杨雄家族避仇逃乱的传统,即为了躲避仇人和世乱,而不断迁徙,并分析这种家族传统对杨雄的性格与思想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太玄》与此的关系。又据杨雄青年时期的作品《反离骚》等,分析杨雄与屈原的不同的思想与人生态度,他提出的“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的思想,对他一生的治学和人生态度有着怎样的影响。《杨雄传》记载了杨雄的治学特点,如博览而不好章句之学,默而好深湛之思等,这与他晚年撰写《太玄》也有密切关系。综合以上这些因素,可以知道杨雄思想的特点,是把儒家和道家综合为一,并体现在晚年所

① 《自序》,即他的“自传”,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论述。

写的《法言》和《太玄》中。

对于杨雄人生的中间阶段的行事,历来学者的分歧最多,本研究考证前人引用的《杨雄家录》、《家牒》及《七略》等文献多是后世伪书,并非原书,故其中所说都不可信。尤其是杨雄的生卒年、至京岁数等问题,自宋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本研究通过全面考察前人的各种说法,形成了几点看法:1. 杨雄至京时间应为元延元年,时年四十一岁,周寿昌“四为三之误”说不可从。2. 杨雄卒于天凤五年,时年七十一岁。后人的其他说法,如《甘泉赋》写成之后而卒,《法言》写就而卒(平帝元始末)等,都是不可从的。其出生年当在甘露元年。陈本礼认为在天凤六年,计算有误。3. 杨雄中年四赋的献上时间为:元延二年正月、三月、十二月,三年秋。4. 杨雄仕莽、投阁、美新等事,皆非乌有,不用为之回护。5. 《汉书·杨雄传》的前半出自杨雄的《自序》,后半则为班固的传述,二者有所不同之处,只在于王音召为门下史并荐之一事,其余无不合。王音之事,有确凿证据明其非是,舍此则无不合。后人或为了回护杨雄仕莽,或专信王音而疑其他,或以王根代王音,皆不能成立。6. 在此基础上,根据杨雄所上四赋考察了杨雄一生中间阶段的活动及其思想,认为杨雄最初自负于自己的文学修养,对汉成帝抱有幻想,数次上赋之后,始知辞赋宏丽而无益于讽谏,于是辍不复为,从此以后的思想开始转变,反映在所撰成的《太玄》与《法言》等著作中,而不再从事文人的辞赋之事。虽然《解嘲》、《解难》等文在形式上还有一定的文采,但内容与《太玄》密切相关,已不可与前期的赋相比。

又考察了杨雄人生晚年阶段的事迹,强调杨雄一生三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明显不同。又考证了《太玄》、《法言》的写作时间,分析了《解嘲》、《解难》的思想,考证了《训纂》、《方言》、《州箴》、《官箴》等著作的相关问题,并对他晚年的交友情况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最后对投阁事件进行考证辨析,以便完整认识杨雄其人及其思想。

关于《太玄》各种版本的考察,分三个部分:1. 杨雄亲手写定的《太玄》原本。2. 《太玄》历代亡佚诸本,包括历代注释本 65 种。3. 《太玄》现存诸本,包括刻本、抄本、校本、注本共 77 种。在这些版本中,对最重要的注本司马光《太玄集注》的成书问题进行考证,指出后人著录司马光《太玄集注》为

十卷,其中只有六卷是他本人的注,另外四卷是许翰的《玄解》,但在司马光注《玄》时还没有看到许翰《玄解》,故司马光不可能将许翰《玄解》四卷与自己的六卷注合为十卷本。后来许多目录学家著录《太玄》司马光《集注》时,却说司马光合许翰《玄解》四卷为十卷本,是错误的说法。人们对此没有考察清楚,所以习惯上统称司马光《集注》为十卷本,这是不合乎事实的。另外对《书林清话》、《书目答问》中关于《太玄》著录时的错误进行了考证,指出了其致误原因。

关于《太玄》体例的考察,一般认为《太玄》模仿《周易》而成书,但《太玄》模仿《周易》在具体方法与结构上与《周易》不一样,因此《太玄》有独特的体例与结构形式,这与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有直接关系。《太玄》的独特体例是阐释《太玄》思想的关键环节,只有准确把握这种体例结构的特点,才能准确理解《太玄》八十一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其体例与结构的要点在于:首先要判断每一首的首辞、九赞的赞辞及相应测辞的吉与凶,而吉与凶的确定,又要根据它们的数及所在方、州、部、家和阴阳昼夜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判断。

《太玄》除正文八十一首外,还有《首》、《测》、《衡》、《错》、《攤》、《莹》、《数》、《文》、《掇》、《图》、《告》十一篇,杨雄说八十一首“泰曼漻而不可知”,所以另外撰作十一篇“以解剥《玄》体”^①。《玄》体即《太玄》正文八十一首,“解剥”即对八十一首进行多种解释,以说明《太玄》的丰富含义。因此研究《太玄》思想的学者都重视十一篇,认为通过十一篇更能了解《太玄》的思想。笔者撰有《太玄校注》一书,对八十一首已有详细解释,故本研究不再就八十一首的内容进行阐释和解说,而对十一篇的思想内容加以研究分析。在《太玄校注》中也对十一篇做了注释,但限于注释的特定体例,还有许多内容无法阐释,故本书对十一篇的解说与分析,又有诸多修改和补充。《太玄》八十一首是玄理的具体应用,十一篇则对玄理从各个角度加以阐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太玄》的丰富思想,这与研究《周易》,既要研究六十四卦,又要研究十翼,是同样的道理。

^① 班固:《汉书·杨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5页。

对十一篇的研究,要准确理解其字句,尽量对每字每句都要阐释,这是理解其中思想内容的前提。没有对原文的全部解释,就不可能对其思想有完整的阐释。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注释,而是对其丰富内涵的探讨,因此其分析必须深入而细致。古代文献都有丰富思想,从阐释学的角度讲,仅靠对字句进行注释,不能完全阐释清楚,但没有正确的字义注释,则对思想内涵的阐释也会发生错误,所以二者必须相辅相成。《太玄校注》已对十一篇字义做了细致注释,因此本研究偏重于分析和阐发其丰富思想内涵,而不多费篇幅进行字义考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对十一篇思想的分析阐发,与《太玄校注》的相关字义考释也是相辅相成的。

对十一篇思想内涵的分析阐发,涉及多种古代文化知识,因为古代学者的知识结构与现代学术的知识结构是大不一样的,《太玄》就更是如此。杨雄对《太玄》有专门的说明:

大渾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搯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①

就此而言,所涉及的知识就有与汉代天文历法相关的浑天、天元、昼夜、泰初历、顓頊历、律历等,与数相关的三、四所构成的三分四重结构和三、九、二十七、八十一、二百四十三、七百二十九等数度,与古代自然观相关的阴阳、大运、终始、象类、五行等,与《易》相关的卦、休咎、搯、策等,与古代社会人文相关的人事、道德、仁义、礼知等,而把这些多方面的复杂知识整合在一个结构体系中,又用了许多方法,如摹、据、数(“数其画”的“数”,作动词使

① 班固:《汉书·杨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5页。

用,“非卦也,数也”的“数”,作名词使用,二者不同)、推、搯、关、緝、播、文、拟等。对这些知识与方法,必须先从字义上弄清其含义,再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理解,才能对《太玄》独特的结构体系及其内容加以深入而全面的阐释。所以这样的研究,如果没有文献学的方法作为基础与前期工作,就算做了一些解释,也往往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

由这些多方面的复杂知识可知,《太玄》的思想来源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太玄》所吸收和运用的丰富知识,是古代各类学科与思想文化的结晶,不是全由杨雄个人冥思苦想而得出的,所以,要对《太玄》思想做到准确而到位的阐释和理解,必须对其中所涉及的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而这些知识都有专门的术语与用法,为此又必须善加运用文献学中的训诂知识与方法,对这类专门的术语和用法通过专门的训诂而掌握其义,如此才能对相关的知识及其在《太玄》中的用法做出准确的解释,这样才能透彻地了解《太玄》思想内涵。

《太玄》的思想丰富而复杂,不是纯粹的儒家,也不是纯粹的道家,而是把儒家、道家思想融合为一而形成的思想体系。研究杨雄的思想,不能只据《法言》,也不能只据《太玄》,要综合考察《太玄》与《法言》。为此要分析《太玄》如何把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融合为一的,以及这种融合的意义所在。此外还要考察《太玄》思想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因为二者都强调“玄”,但对“玄”的理解并不一样,可在某种意义上又有着一定的关联,对此也要根据《太玄》与魏晋玄学的相关说法进行分析。

《太玄》的思想表达受外在形式的影响很深,其最大的特点是三分思维,即把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称为始、中、终,一、二、三,三摹四分、三摹九据等,其基础就是一、二、三的三分法,在三分的基础上形成四重(方、州、部、家),但三分是整个《太玄》结构的基础,三分也是《太玄》思想的核心。这与《周易》的阴阳二分思维不同,而与汉代历法的三分有着密切关系。但《太玄》又在三分结构中整合了阴阳二分,也不是单纯的三分。这样的三分思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意义,对此需要进行分析。另外,还要注意在孔子与老子思想中也有三分的因素,要与《太玄》的三分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历代有不少学者对《太玄》发表过自己的评价,对此需要搜集和整理,还有一些学者对《太玄》写有序录题跋一类文章,其中也有关于《太玄》的评价。今天分析研究《太玄》,不能不了解前人的这些评价,因此需要搜集整理此类资料。这包括西汉的桓谭、刘歆、东汉的张衡、班固、王充、三国吴陆绩的《述玄》、晋代范解的《解赞序》、唐代王涯的《说玄》、宋代司马光的《读玄》和《说玄》、苏洵的《太玄论》和《太玄总例》、程颐、朱熹、苏轼、林希逸、晁说之、许翰、朱震、叶适、杨时、孙复,元代的吴澄、明代的叶子奇、清代的黄宗羲、王夫之、傅山、钱大昕、唐仲冕、郑维驹、陈本礼、刘斯祖、章太炎等人。这是研究《太玄》不可或缺的资料汇编,故亦作为本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对此做了充分的搜集,比如对《四库全书》,利用电子版进行了全文检索,从中搜集整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没有搜集和整理过的,还有不少是前人转引而失其最初出处的,笔者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搜集整理,列为本书的附录。

三、文献学与思想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杨雄其人及其重要著作《太玄》,这一研究涉及思想的研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但在方法上与通常的思想史研究和历史人物研究有所不同。笔者强调的研究方法,是把文献学的方法应用到思想研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之中,形成一种全面解读古代文献及其思想内涵的方法。

笔者说的文献学,是历史文献学,是国家所定的一级学科历史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而同样属于一级学科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图书馆学中,也有属于其二级学科的文献学,但其性质与范围与历史学科的文献学有所不同,因此其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属于历史学科的文献学,把所有的历史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历史文献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门类的文献(如经、史、子、集的史部),而且包括一切历史资料,都视为历史文献。换言之,凡是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都可以视为历史文献,经、史、子、集中的文献都可以看做历史文献。这个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对象就是这个意义

上的历史文献,研究目的是据这些历史文献研究其中的内容,以求对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思想、文化、学术等问题有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但这种研究,首先必须对所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不经过科学整理的文献,在研究中加以引用往往会出现许多理解上的问题,从而导致研究成果中观点和理解的不可靠甚至是错误。如有人引用《论语》的“人无信不立”,把“信”字理解为“信仰”,就是完全错误的,背离了文献的本来含义,可以说是望文生义。如果基于这种错误的理解来论孔子和儒家,其结论和阐释就可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文献的整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献本身原貌的恢复,二是文献文本的基本解读。文献原貌是指文献最初的本来样子,换言之是把文献在后来的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误都要发现出来并证明白然后加以消除,以恢复文献最初的面貌,亦即消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错误。所谓错误主要指文本中的错误,即文字的衍、误、脱、错、倒等。文献学之所以讲求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的知识与方法,就是为了发现并验证文献在传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错误,而文字、音韵、训诂等学的知识与方法,则是用来论证文献中的各类错误究竟错在哪里、错误如何产生以及恢复未错之前的原貌。文献文本的基本解读,是对文献文本字义的基本训释和理解,也要用到文字、音韵和训诂等学的知识与方法,但利用这些知识与方法,仅能解决文本字义的基本训释,至于完整全面深入理解其中所包涵的丰富思想内容,仅靠此三种学问的知识和方法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方面更多而深刻的知识与学养。

在对文献的全面整理与基本解读基础上,还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包括整理与研究两个层次。研究必须以整理为基础,不少研究者把整理与研究分开,整理者只进行整理,研究者只进行研究,这种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本来要求。因为整理如果仅仅是标点注释和考证文字异同正误等,也必须借助大量资料的搜集而对文献文本的正误有所了解,避免被文献文本中的各类错误所误导。但这种意义上整理还不涉及对文献文本内容的理解与解释,就算有一定的注释,也仅是文字的注释,而不涉及更多内容的解释。更何况还有许多整理并不进行注释,仅仅进行标点,而且

不少标点也不进行版本的校勘,不发现其中的错误并进行考证勘订。如果把这种整理也作为学术研究,则其学术意义则无从谈起。而所谓的研究,则对文献并不进行充分的整理,则所从事的研究对于所要应用的文献本身的读解,就会有各种不够深入和准确之处,因此这样的研究所形成的观点与结论,也往往不具备科学性,其学术意义也无从谈起。因此笔者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必须从文献整理和内容分析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和用力。因为一般的整理,没有提供足够的文献解读内容,而一般的研究对文献本身的内容也因为没有足够的整理与解读而显得阐释苍白无力或分析肤浅。而现有的整理也不能为研究提供足够的解读基础,所以更要对文献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整理,包括文本的正误整理及文义的全面解读,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整理所不具备的。有了这种意义上的整理,才谈得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分析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于是研究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所做的分析阐释才会更有深度和可靠性。

以《太玄》为例,如果只对它进行文献的整理,如进行版本校勘、文本衍脱讹错的疏理与考证以及标点注释等工作,而不进一步研究文本中的丰富内容,则不能称为学术研究。要对《太玄》进行完整的学术研究,也不能不亲自对它进行文献文本的整理与解读,如果沿用一般思想史的方法,仅从几个角度来谈其中的思想,从书中选取一些句子用来说明其中有什么思想。这种方法,把《太玄》全书的文本置于脑后,只就其中部分文句进行阐释,不能说是研究其中思想内涵的正确方法。而要对《太玄》全书的文本进行解读,又超出了整理阶段的解读层次。整理阶段的解读,是基本的解读,即根据训诂学对具体的字进行释义,或对全句进行串解,也仅仅是对文本做字面上的初步解读,没有深入到文本的深层思想之域进行深入探讨,这种研究仍是不充分的,故其成果不能令人满意。

根据阐释学的方法,文献的文本作为表达思想与更多内容的载体,与所要表达以及所包含的内容之间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即文本所承载的内容远远多于文本字面所能表达的意思。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周易·系辞》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所组成的“书”,不能完全表达作者所要说的话(言),作者所要说的“言”,也不能充分表达他的

思想(意)。这并不是说“意”完全不可见,而是说仅靠“言”不能充分了解“意”,要充分了解“意”,就要超出“言”,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所以《系辞》又说:“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所谓的“尽意”,就是通过“象”来充分理解其“意”,不是说“象”本身就能完全表达出其“意”。所谓的“尽”,要靠人的思维和分析来完成,仅靠“象”是不能自动“尽”其“意”的,不然的话,人的思考与分析也就不必要了。

言不尽意,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命题,注重思辨的学者对此都非常重视,如《庄子·天道》篇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书”由“言”和“语”组成,而“言”与“语”的宝贵在于它所表达的“意”,但“意”不能完全由“言”来传达。一般人只重“书”和“言”、“语”,不知“书”和“言”、“语”不足以表达“意”。真正可贵的不是“书”和“言”、“语”,而是“书”和“言”、“语”之外的“意”,即郭象注释时所说的“其贵恒在意言之表”。“意言之表”即言语之外的“意”。《庄子·外物》篇又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也是说“言”与“意”不是简单相等的,需要另外思考获得其“意”,而且能得“意”的人非常难得,所以才希望有这种人出现而与之交流。

在魏晋玄学时代,人们同样关注这一问题。如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

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在“言”与“意”之外又提出“象”，“象”不是“言”，但性质上与“言”差不多，都有可见性，都是用来表达“意”的，即所谓“出意”。不管是“象”是“言”，读者最终是要通过它们来得“意”，“象”与“言”是得“意”的媒介，但不能等同于“意”，其完整的“意”在“象”与“言”之外，当然“象”与“言”本身也表达一定的“意”，但不是全部的“意”，所以达到得“意”的目的之后，“言”与“象”都不再重要，都可以忘掉，这与庄子的思想一致，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认同的一种思维方法与目标。与王弼同时的荀粲也说：

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①

认为“意”是“理之微者”，是在“象”之外的，而且是“蕴而不出”的，所以仅靠“象”或“言”是不能直接获得的，必须通过人们的思考才能获得。

在学术研究上，重视“言不尽意”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代文献传留到今天，人们在阅读这些文献时就有了整理和解读的问题，整理需要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而解读既需要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更需要历史、思想和文化的丰富知识与广阔视野。由于人们掌握的知识与方法有所不同，所以对文献文本的解读会有深浅之分，解读浅者一般只从文献文本的字句表面加以解读，而不深入探求更多的意旨，完全忽视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普遍规律，这样的解读和研究，在学术研究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定要随时注意“言不尽意”的问题，知道据有限的“书”和“言”来解读阐释其中的丰富的完整意旨，只能得到浅层的解读，要明确知道文献文本还有超出字句的更多含意，对此需要学者通过专深的思想分析研究加以深度解读，否则对古代文献所包含的内涵与信息就不能充分掌握和理解，从而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也不能达到充分的程度，这样的研究得出的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9—320页。